

21世纪诗坛“命名热”的症候式分析

白晨阳

(国家开放大学 人文教学部 北京 100031)

[摘要] 21世纪诗坛继承了诗歌热衷于命名的“小传统”,并进一步彰显为“命名热”现象。它呈现出诸多的新变和特殊性,其中策略性和炒作意识最为突出。这种现象对于活跃诗坛、打捞诗歌“遗珠”与催生诗学新质有重要意义。但“宣言大于创作”、思维单一、概念混乱等问题,导致了命名有效性的削弱,反映了诗人的焦虑心态、诗歌批评的乏力以及“小圈子”化倾向,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关键词] “命名热”;有效性;小圈子化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1710(2018)05-0133-07

DOI:10.15886/j.cnki.hnus.2018.05.018

针对某一时期、流派、社团和历史片段的命名,与文学本身的进程相生相伴,密集地散落在文学史的序列中。就不同文体来看,诗坛对于命名的热衷向来都是不言自明的,诗歌史中的命名无论从数量还是频率上都远远高于其他文体^①。西川将“民刊策略”称作是中国诗歌写作的“一个小传统”^②,他是指与其他文体相比,诗歌(尤指新时期诗歌)倾向于依附非正式出版物来有效地参与到文学建设中来。套用这一指认“传统”的逻辑,中国诗坛对命名的热衷也可被称作中国诗歌的另一个“小传统”。纵观21世纪出现的“一揽子”命名,不像现代文学时期那般循规蹈矩、水到渠成,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集中涌现势同“井喷”,应该说对命名“小传统”的继承是延续中有新变。对于这一在诗歌发展进程中凸显而出的命名高潮,本文将概括为“命名热”现象,并尝试对其呈现的特殊性及其为诗坛带来的价值和隐忧进行症候式分析。

一、“命名热”现象扫描及其价值确认

21世纪诗坛不仅承嗣了诗歌命名的“小传统”,并且还将其“发扬光大”,各式命名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形成貌似“百家争鸣”的喧嚣之势,以至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玄怪的命名综合症”^③。各种命名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应者如云,一时间蔚为大观;有的仅仅是几个诗人、批评家的自说自话,提出之后几乎是无人问津,紧接着便草草收场;有些命名之间由于在诗学主张或诗学之外的因素上存在看似不可调和的分歧,而不断引发论争和较劲。沿着21世纪诗歌的发展脉络进行大致梳理之后,可以总结出较有影响的命名如下:70后、下半身、第三条道路、荒诞诗写、“新死亡”诗写、生态诗歌、打工诗歌、80后、90后、中间代、垃圾派、低诗歌、草根性写作、中产阶级写作、新红颜写作、梨花体、羊羔体、神性写作等等。

“命名热”除了指数量大,还有几个独特的表征。首先是速度快,也就是命名行为的即时性。对比此前的诗歌史,除了第三代诗歌群体之外,命名在时间上多表现出一定的后置性,是在有了特定数量的文本积累、稳定的创作风格之后进行的概括总结(譬如九叶派、朦胧诗)。而当下的命名针对的更多是正在进

[收稿日期] 2018-03-08

[作者简介] 白晨阳(1990-)女,山东聊城人,国家开放大学人文教学部教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新诗研究。

① 以朦胧诗之后的80年代诗坛为例,作为诗歌命名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新生代”诗潮裹挟着如下一连串的名称奔涌而下:“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海上诗群”“整体主义”“撒娇派”“野牛诗派”等。仅是在《深圳青年报》《诗歌报》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中,便陈列了由一百多位诗人组成的六十余家自称的“诗派”。

② 西川《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③ 罗振亚《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东岳论丛》2011年第12期,第20页。

行中的、“未完成”式的诗歌表征,有的甚至只是初露头角,既无鲜明的理论旗帜,也无统一的创作倾向,文本数量也还未成规模。譬如“新红颜写作”就是指新兴的女性网络博客书写,“90后”诗歌是指刚刚开始写诗的、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们的创作,她/他们的面目尚不清晰,风格也未成型,命名者却已经及时跟进,迅速为他们贴上了标签。其次,命名角度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80年代、90年代的诗歌命名几乎都是从诗歌的诗学主张入手,此时的诗歌命名则是艺术风格、诗歌主题、写作主体、出生年代等多种命名角度共存。可以粗略地被分为以下几类:代际性命名,以诗人的出生年代划分,譬如:中间代、“80后”诗歌、“90后”诗歌等;概念性命名,例如“下半身”“中产阶级写作”“新红颜写作”“草根性诗歌”“荒诞诗写”等,此类命名或是试图总结某种已经出现的写作倾向,或是致力于宣扬某种诗歌理论;恶搞性命名,代表性的有“梨花体”“羊羔体”,这种命名与网络文化有关,是关注诗歌的网友出于批判和不满,对某些诗歌写作方式的恶搞、调侃。另外,90年代末之前的诗坛,在传播媒介和讨论平台上整体而言是以传统纸媒、学术会议为依托,到了21世纪网络媒体已经呈大热之势,诗歌网站、论坛、博客、公众号数量大增。比较有影响力的诗歌论坛就有,“北京评论”“天涯诗会”“北大”“诗江湖”“诗生活”“锋刃”“界限”“橄榄树”“阵地”“灵石岛”“扬子鳄”“北回归线”“诗歌报”“个”“橡皮”“国际汉语诗歌”“翼”等。网络在发声和传播方面的优势明显,因此出现了大量依托网络而进行的诗歌命名行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下半身诗歌(出现在世纪之交)、垃圾派、废话写作、低诗歌、智性写作、地缘写作、后政治诗写作、物写作、神性写作、草根写作等。

除了以上三点——即时性、多元化和网络化之外,“命名热”最为显著的特点当属策略性和明显的炒作意识。具体来讲,是指操作者讲究策略和方法,命名过程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其中对宣传效果和轰动景观的营造最为重视。可以说,命名的整个过程都是有所设计有所分工,包括如何筹措经费、与媒体互动、向批评家约稿、集结出版诗集、利用互联网制造声势,等等,都体现出专业“策划人”般的有条不紊,正如诗人安琪直接将“中间代”的命名称为“事业”。而“中间代”命名过程中呈现出的策略性,在21世纪诗坛确实是最有典型性的个案,可以将其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中间代”的出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筹备与亮相。在2000年安琪和黄礼孩产生了为处在“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诗人做一个选本的想法,并与2001年付诸实施,由黄礼孩负责筹措经费,安琪则负责组稿工作。安琪初步拟定了50位诗人作为编选对象进行约稿。在精心拟定的稿约中,安琪明确提出要为“沉潜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这一代诗人作证”,同时也向被约稿者征求一个群体性的名称^①。现代通信工具的发达,使组稿工作在短短两个月内便顺利完成。2001年下半年,完成选编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将“中间代”命名提出,并在序言中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和界定^②,标志着“中间代”的正式出场。第二阶段是宣传推介。安琪等人在自我阐释之外,向数位知名诗歌批评家邀约以获得更具权威性的“声援”,如陈仲义、程光炜等,使“中间代”其名在学术界获得了初步的关注(这些评论文章被集中收编进民刊《第三说:中间代诗论》中。与此同时,通过传统纸媒、互联网、诗歌活动等方式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仅在2002年的1月份,“中间代”就登上了《诗选刊》《诗歌月刊》等专业刊物的版面,《海峡都市报》《羊城晚报》也对其进行了相关报道。并在第三说、诗江湖等影响较大的诗歌论坛、网站上发表诗歌诗论。第三阶段,“入史”的努力。“中间代”的发起者们并不满足于在民刊和网络上的风生水起,而是早就预设了接续诗歌史的目标,2004年6月正式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更是彰显了“入史”的企图心。诗集上下两卷共有2560页,收录了82位诗人的2200多首诗歌,堪称浩瀚之作。对于选编这部诗集的初衷,安琪毫不掩饰其要为诗人写史的动机:“我们前面的第三代有一个《后朦胧诗全集》,影响很

① 安琪《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关于中间代》,《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年总第2期,第111-118页。

② 中间代是指“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的天下大同。”安琪,远村,黄礼孩:《中间代诗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6页。

大。我就想 我们中间代也应该有一个全面的全景式的全集 以便诗人和诗歌理论家进行研读”^①。同样, 深谙推广之道的诗人们 在新华网、网易等门户网站上 打出了全集出版发行的广告海报, “邮购启示”也出现在各种诗歌网站、诗歌论坛上。从对“中间代”命名之路并不算详尽的梳理之中, 可以看出贯穿始终的策略性和借鉴自娱乐圈的炒作意识 这种“精明”的推销和宣传 与第三代诗人们满腔热情的、运动式的宣传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可以从中看出时代给诗坛烙下的不同印迹。应该说, “中间代”集中体现了 21 世纪诗歌命名在具体操作上的路数, 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21 世纪诗坛频繁的集体命名 就如同一个接一个的“定向爆破” 在声势上打破了 90 年代的“沉寂”, 为诗坛聚敛了诸多的人气,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世纪诗歌的“回温”。纵览空前热闹的诗歌现场, 许多都与某一命名的出现有关。一方面, 命名推动了诗歌活动举办。为了扩大影响力, 命名的发起者们必然会主动开展一些系列相应的诗歌活动, 比如召开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 开办诗歌论坛, 紧接着便是会议论文的出炉, 其后还会进行相应的诗歌评奖。另一方面, 刺激了诗歌出版界的繁荣。以诗歌选本为例, 出现了众多的以某一集体命名为关键词的诗歌选本, 其中的一些在编选标准、诗人覆盖面和诗歌水准方面都有亮点闪现, 值得学界的关注。它们包括《第四代诗选》《70 后诗人诗选》《70 后诗集》《70 后诗歌档案》《80 后诗歌档案》《21 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21 世纪诗歌精选——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等。这些选本的出版 除了丰富了诗歌出版市场, 最重要的是还为读者接近诗歌提供了通道, 有助于诗歌在文坛地位的回升。

集体命名的方式有助于诗人的集结和出场, 个体的声音再高亢嘹亮也容易陷入被削弱、甚至彻底“屏蔽”的境地, 群体命名为个体抒唱提供了汇入诗坛多声部重唱的入场券。一些优秀的诗人或是由于一贯低调, 或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得到评论界重视, 而面临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命名的提出, 使他们以集体的形式被打捞出来, 从而获得应有的关注和荣誉。就“中间代”来看, 他们那批诗人经历过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商品大潮和流行时尚的围攻, 始终保持诗艺的自觉和自律, 经过十多年孤寂的写作, 已经积累出可观的文本数量, 譬如伊沙、桑克、安琪、臧棣等人。然而前面的“第三代”不断被书写和肯定, 后面的 70 后、80 后也在引发热议, 他们却在前后“夹击”中处于不被讨论的沉寂状态, 难免会产生危机感和失落感。而世纪初的这次命名, 是一次充满“拾荒”意味的集体亮相, 最直观的成效便是帮助他们实现了在诗歌谱系中的身份彰显, 并且为后续的言说提供了方便。这无疑是给这批诗人们一种整体性的肯定, 部分地呈现了他们曾被遮蔽的面目, 从而为进一步挖掘、催生他们的诗学价值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努力。

命名是处理当下诗歌的手段和策略, 同样也是诗歌批评的形式之一。因此“命名热”的出现, 也应当看作是批评界保持对当下的敏感度、重视捕捉诗坛现场感的表现。譬如说, “90 后”诗歌的提出, 虽然连诗人本身也还尚未有明确的群体意识^②, 批评家们还是通过对“冰山一角”的切近观察, 认为 90 后诗人已经浮出水面并足以引起诗坛的重视, 并且还准确地捕捉到青春期焦虑、普遍质疑、敢于挑战等概念, 赋予“90 后”诗歌以普遍性。再比如, 李少君在 2003 年提出“草根性写作”并且大力推介, 其实是在推进这一名称所代表的诗歌流向的发展, 即书写底层经验、道德承担, 强调本土性、原创性。而经过此后十多年的持续创作, “草根性写作”已然成为 21 世纪现实主义诗歌中的重要一脉。应该说, 那些处在诞生期、萌芽期的诗人诗作, 或许在诗歌的技艺层面、精神内蕴层面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境地, 但极有可能已经显露出某些可贵的诗歌生长点。如果所有的批评家都因其稚嫩而选择无视或者排斥, 就会忽略其中蕴含的发展动力, 甚至会在无形中放弃了一些优秀的诗学资源。从这一方面看, 批评家们争为“正在进行时”的诗人写作进行命名的努力, 对发现和建构 21 世纪诗歌的新传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① 安琪《中间代: 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702/0406845992.shtml> 2004 年 7 月 2 日访问。

② “90 后诗人”原筱菲即认为他们 90 后的诗歌创作“不可能有特定的、自足的诗学内涵和美学属性, 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段时间里谈论诗歌现象、诗歌问题的一个‘由头’”。

二、被质疑的有效性

如果我们对“命名热”现象做更进一步的细致观察,其中潜藏的问题也随之凸显。命名的即时性有鲜活的现场感,但缺陷也由此而来,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必要的观察距离,命名者不能从“现场”中抽身而出,便无法获得可贵的旁观者视角,因而很难做到足够冷静的评析,因为在深广度上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在这种与对象粘连不清的处境下,更易不自觉地带入一些与诗歌、诗人无关的“非诗”因素,造成了命名话语的轻浅甚至失效。策略性和炒作意识能迅速打开知名度,但也让命名行为带上了追逐象征资本的功利意味,它们在短期内的“成效”刺激了一些批评者的神经,让他们急于在诗评界圈出自己的地盘,从而使所谓的批评话语沦为对某种诗潮诗风的片面鼓吹。这些频繁出现的命名,为个人、群体提供了简单、快速、直接的出场方式,但是简单有可能意味着粗暴、快速也许会导致仓促、直接也容易带来肤浅,而这些最终威胁的便是命名本身的有效性。

命名行为中普遍存在“宣言大于实绩”的倾向,这在诗人自我命名的情况中尤为明显。具体而言,诗人们先充分标榜自己所属的群体具备分量十足的文学史意义,或者说在诗学建设上有超越传统的创新,然而其真正的文本创作和理论建树却存在“名不符实”的尴尬。以“80后”诗歌的出场为例,在被誉为“80后”第一本诗学理论集的《蓝星:80后文论卷》中,大部分的文章都在标明“断裂”的姿态和“超越”的决心,然而文中表达的很多观点、立场其实在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中都有过周密、详细的论证,而这些所谓的“80后”诗歌理论家硬是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选择视而不见。事实上,本书与其说是诗学理论集,倒不如说是一本宣言集,其中不乏叛逆、偏激甚至是明显幼稚的言论。譬如春树便号召所有80后“联合起来”,理由则是他们缺乏诗坛的关心和“扶植”、需要自己“扶植”自己,甚至是为了打破无聊、追求“轰轰烈烈”的青春。显而易见,他们更多地是在渲染自己作为年轻人受排挤、受压制的局面,企图通过召唤群体共鸣来获得认同和关注,却普遍缺乏主动进行诗学建设的意识,更没有进入沉潜的创作状态,以至于他们口中的“断裂”和“超越”由于仅停留在新的生活态度和言行方式上,从而成为了一种想像性的完成。正如有的批评家在提到一些诗歌命名时说到“这个时期的诗人,理想都很高远……均有自己很高的目标定位,可惜的是它们的创作常常在理论之后爬行,难以抵达希望的高度。”^①命名理论和创作实效之间各行其是、难以同构,无法形成对话互相促进,因而有效性也必然随之削弱,甚至沦为口号的空转。

检阅世纪之交以来的命名队列,不难发现热闹之下其实潜藏着尴尬的“命名困难症”,命名方式看似多元实则贫乏、单一。一方面命名的数量众多,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从诗歌外围出发进行共性的指认,而非诗学本体的考量,譬如性别属性(新红颜写作)、阶级属性(中产阶级写作)、职业身份(打工诗歌)等。最为突出的是,“70后”诗歌、“中间代”、“80后”诗歌、“90后”诗歌等以出生年代划分的命名,在十几年间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应该说这种“捡现成”的命名思维易于操作、简便直接,仿佛是迅速把握了某一群体的共性而使命名具备了天然的有效性。但因为过多地着眼于诗歌外围的特征,难免会分散对于诗歌文本本身的关注,也使得命名缺少了针对诗学建设的提炼和概括。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命名者急切有余、斟酌不足,加之专业性的欠缺,造成命名的简单随意、失之严谨,引起包括被命名者本身在内的诗坛人士的不满。以“新红颜写作”为例,命名是针对年轻知识职业女性在博客上写诗的现象而提出的,但它在措词上是否恰当,一直存在争议。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红颜”特指青春貌美的女性,且从“红颜”的使用主体来看,通常是男性对貌美女性的称谓,还常有“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等偏向贬义的惯用语,这使得“红颜写作”有一种为男性“看”而写的误导,还隐约带有贬低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平等性的偏见。而“新”在语义上带有与“旧”形成对比的相对性和时间性,但又没有给出与“旧”之间的明确界限,因而“新”在内涵上也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即便是入选《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的女诗人们,公开该命名表示赞同者也

^① 罗振亚《新世纪诗歌形象的重构及其障碍》,《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第25页。

是寥寥,它更大程度上是命名者和倡导者的自说自话,因而其有效性也是可疑的。

还有一些命名之间存在明显的概念缠绕、含义交错,单是字面上的相似度,就足以挑战一般读者甚至专业研究者的理解能力,它们之间的似曾相识令人困惑,并且,还由于概念的相近似而引发不同命名主体之间的争端,加剧了诗坛的乱象。譬如“下半身”与“垃圾派”,前者颠覆既有的身体美学和诗歌秩序,明确提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后者提出崇低、向下、审丑等一系列口号。同为 80 年代第三代诗歌中“口语诗”一脉的延续,它们却出人意料地在网络上进行相当激烈和持久的论争,“战火”从 2003 年烧到 2004 年,互相攻击对方的理论和作品,呈现水火不容之势。这两者的官司尚未断清,2004 年又有“低诗歌”的名号出现在各大诗歌论坛、网站,将自己标榜为“网络文学革命的前潮”,但是仅仅是从名称来看,就已经与两位“前辈”有诸多相似之嫌。当研究者试图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作“史”的观照时,面对此三者难免感到茫然、混乱,在逐一的分辨和整理之后,不难发现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它们的诗学主张从本质上讲共同汇成了新世纪一股新的写作维度“即从‘贱民’立场出发,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底层、关注人的肉身价值,关注人性与事物的阴暗面,直面当下状况的粗鄙写作潮流。”^①如此带有反讽意味的结论,无法不让人质疑这些命名的意义和有效性。

三、背后的反思: 焦虑、乏力与小圈子化

“命名热”作为诗歌现象的一种,为我们观照 21 世纪诗坛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角度。可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以及命名在有效性上普遍存在的羸弱和不足,反映了当下诗坛在诗人心态、诗歌批评、诗歌生态等方面潜藏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首先,诗人热衷命名、急于命名,映射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边缘化”处境,诗歌的声望并没有随着“新世纪的太阳”一同升起,相反,大众消费文化进一步挤压着诗歌仅有的那点影响力。本就敏感的诗人们清晰地意识到,诗歌在总体上对所谓象征资本(具体指声望、权威、头衔等)的占有已经岌岌可危,如果还要保持诗人一贯的高贵、静穆和冷眼旁观的姿态,那么自己的诗歌声音极有可能在无声中被忽视、甚至被淹没。正如安琪阐释为“中间代”诗人命名的必要性时所说“在这样一个浮躁而冷漠的时代,要读者自来读到你的天才之作是概率很微小的,要评论家自觉地发现你这样的天才也是概率很微小的。”^②诗歌外部处境触发的焦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焦虑来自于诗歌场域内部的话语权争夺。21 世纪的诗坛,形成了老、中、青等几代人“同台竞技”的景观,老一辈诗人诗思依旧活跃,宝刀不老,中青年诗人也出手不凡,诗写的艺术功力不断打磨日趋深厚,并且一直有更年轻的诗歌新人在争相涌现。处在新老不断更迭中的诗人们,愈发感受到被“埋没”的危机感,他们急于为自己发声、急于在诗歌谱系中谋求一个明确的身份,强烈的命名冲动也随之被唤起。体现在具体的命名行为中,即对“身份无可取代性”的一再强调。譬如颇为流行的“代际式”命名,命名的内部动因并非出自诗学建设的诉求,而是出自显而易见的身份焦虑,它们尤其善于将前代诗人建构成急需超越甚至对抗的诗歌敌人,不断用断裂的姿态和求新求异的口号来标榜和确认自己。“80 后”的代表诗人之一春树,在表述自己所在群体的属性时说到,“我们喜欢诗、喜欢写诗,就仅仅是喜欢,是写,是玩,是让我们更快乐的一种手段、一种表达。仅此而已,别无其他。”^③这也是一种基于突出自我特殊性的表达,“仅仅”“仅此而已”表明这种态度独属于“80 后”,“别无其他”的“其他”指向的自然之前的“70 后”“中间代”等前代诗人的诗学主张,也是诗人们焦虑心态的无意识流露。应该说,命名作为一种发声,一定程度上帮助诗人争取到诗歌场域中的话语权以及对“象征资本”的占有,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无处不在的身份焦虑。“命名热”与诗人的身份焦虑互为镜像,共同指向了 21 世纪诗坛躁动不安的隐疾。

① 陈仲义《中国诗歌前沿聚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0 页。

② 安琪《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第三说:中间代诗论》2002 年总第 2 期,第 111 页。

③ 陈仲义《在焦虑和承嗣中立足“70 后”、“80 后”诗歌》,《文艺争鸣》2008 年第 12 期,第 52 页。

其次,“命名困难症”反映出当下诗歌批评的乏力和创作力的匮乏。不可否认,诗歌命名是一种处理当下诗歌的手段和策略,属于诗歌批评的形式之一,因此,“命名热”及其相关的种种必然与当前诗歌批评的水准和风气有关。命名在短时间内集中登场、竞相发声,在表面上看是批评的敏锐和在场,但实际上一方面掺杂进了诗歌批评之外的某些虚假的繁荣,另一方面,过于及时甚至超前的反应也会导致空泛和失效,从而暴露了批评在现实上的缺席和滞后。这在21世纪的诗歌批评界已经不是新鲜事,批评家们被光怪陆离的商品文化和消费场所干扰,在越来越多元的文学场域中失掉了应有的冷静客观和有距离的观察立场,甚至被诗人们的浮躁和焦虑所裹挟,沦为他们造势并分享利益的“共谋者”。这种游离在诗歌美学之外的走偏,让诗歌批评无法抵达诗歌的真相,公信力也随之大打折扣。当前诗歌批评与新世纪诗歌一样,看似多元共生,生机勃勃,但是在各式各样的评价、衡量标尺之中,能真正包含批评者独特的感悟力、判断力与洞察力,并且能真切地感知诗歌肌理的有效批评,却是寥落可数。

再次,以前文提到的代际式命名为例。诗歌批评疲软乏力,批评家面对诗歌现场时找不到更具概括力的切入方式,但又急于为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发声和“鼓吹”,只能一次次选择用诗人的出生年代进行命名:70后诗歌、中间代、80后诗歌、90后诗歌等。完全按照写作者的生理年龄来自动站队,以出生之日便具备的“自然身份”来置换“历史身份”,这种方式简便易得,可以省掉诸多复杂的考量。批评家完全不用耗费“一兵一卒”,又无需承担是非判断层面上的质疑。然而,以“代”来划分差异分明的诗人写作,其合理性也是非常可疑的。韦勒克和沃伦就表达过此种态度“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实体,‘代’这种概念是不会解决什么问题的”,并举例1900年和1901年,虽然不属于同一个世纪,但“从生物学的观念看,这些都完全是相同的”^①。同时他们还指出,文学的沿革无疑会受一批年龄相仿的写作者所影响,但那也仅仅是一个有力的社会影响罢了,仅以“代”的划分作为根据并不足以解释文学变化。一些诗人,比如周伦佑,也认为用代际的方式划分和命名诗人,是一种牵强的做法。虽然代际命名不是没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方式在21世纪诗坛上出现的频次如此广,不得不引起重视和警惕,如果这种命名方式十年又十年地无限延续下去,我们诗歌批评的想象力会愈发显得尴尬和单调。当下诗歌已然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个人化诗艺的持续探索也意味着创作风格的日趋多元,诗歌批评如若想同时抵达丰富深邃的诗境,必须要与这种发展路向保持一致。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优秀的诗歌批评应该“召唤着诗歌与批评的新型关系的建立:平等、信任与共生。平等意味着,有多少种诗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就有多少种批评的想像力和创造力。”^②只有这样诗歌批评才能获得深刻厚重、持久有效的品质,并实现公信力的回归。

第四,“命名热”与诗坛日益加重“小圈子化”互为因果。21世纪以来诗坛的“小圈子”写作倾向有所增强,如果说90年代的诗人们以个人化写作为准绳坚守自我的同时,还尝试和不同写作路向的诗人互相交流和借鉴有益的诗学资源,那么到了新世纪,诗人们明显更乐于“拉帮结社”,营造出小群体、小集团的景观。并且在圈下一块地盘之后,相互间都热衷于各自团体内部的经营,互相间各行其是,少数的交流也多是以动机复杂的论争为主。应该说,“小圈子化”倾向促成了“命名热”现象在21世纪的出现,而反过来“命名热”又导致了此倾向的进一步突显。简单易记的名称更便于“拉帮结社”,而这些命名者们又大都深谙宣传之功效,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双管齐下,频繁集结出书、举办活动,甚至有时借用娱乐圈的炒作风气手段来为自己博得眼球。有的甚至发展到不在乎作品风格和质量,只要拥护其诗学主张者皆可以加入。正如有批评者所言,“命名者就像一个个深谋远虑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人们还不了解土地的巨大潜在价值时,毫无约束地出来‘圈地’。”^③于是,诗歌派别不再纯粹以诗学风格的相似来聚集,反而更多地去关注意气是否可以投合、利益是否可以共享。因此,21世纪有不少流派命名,虽然在艺术上无任何可供炫耀之资,却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集结,似乎就此具备了在诗坛发声的权利。更进一步说,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9页。

② 魏天无《诗歌与批评的新召唤》,《文艺报》2008年2月19日第3版。

③ 刘春《当前文坛的“圈地潮”与“马甲癖”——以“新红颜写作”为例》,《大家》2011年第21期,第5页。

“命名热”之下是诗歌场域之内的过度分化,而这除了赋予诗坛以喧腾表象之外,实则阻碍了诗坛内部的良性互动和对话,削弱了诗歌这一文类在整体上的创造力。

因此,为诗歌命名时要避免落入这种“细分惯性”设下的陷阱,不应因一味求新求异而把共性强行切割,归纳和整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有的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诗歌的参与者应该“在横向上试图寻找日益细分的群落在新的文化情境中可能具有的最大公约数”^①。或者说,要尽可能把关注点放在对诗学本质的概括上,去思考如何将命名晋升为一个美学概念,而非其他的什么,这样方能在命名和诗歌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联,命名的有效性才会更加持久。具体而言,就是要多从诗歌文本入手来寻求命名的可能,为人们提供一种便于进入诗歌内部观察的视角,而不是那些零碎的、外围的、“非诗”的扫描。正如程光炜在探讨“90年代诗歌”命名的有效性时提到的那样,“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用更学术化,属于那种严格的文本批评的方法为当下的诗歌现象命名,怎样通过一种能够交流的,而不是诗人拒绝与之交流的语言构成事实上的对话”^②。

对于某个具体的命名来说,不管给一群人贴上怎样的标签,有了宣言、运动及其所造成的景观就已经足够了,无非是为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提供了方便。但对于诗歌本身而言,这一切还远远不够。说到底,真正构成诗歌史主干的,还是那些自成一派的大诗人以及他们沉甸甸的文本实绩。命名本身无可厚非,但没有必要过度热衷和急切,相比之下,给诗人、诗作以时间去静候它们的成长来得更加实在。总而言之,“命名热”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从而为生长与隐忧并存的 21 世纪诗歌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和突破。

[责任编辑:吴晓珉]

A Symptom Analysis of “Craze for Naming” in the 21st Century Poetry Circles

BAI Chen-yang

(School of Arts and Law,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little tradition” of poetic zeal for naming is inherited in the 21st century poetry circles, which is further highlighted as a phenomenon of naming zeal. Among its various kinds of new changes and particularities are strategy and hype consciousnes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vigorating the poetry circles, saving the “missing poems” and creating the new quality of poetry. However, declaration beyond creation, single thinking and confusing conception and so on all weaken the effectiveness of naming, which reflect the anxiety of the poet, the weakness of poetry criticism and the tendency of “small circle”. All these should call forth enough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Key words: craze for naming; effectiveness; “small circle” tendency

① 胡续冬《近十年来的诗歌长域:孤绝的二次方》,《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第72页。

② 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山花》1997年第3期,第74页。